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维吉尔注疏集

王承教 ● 主编



王承教 ● 选编

# 《埃涅阿斯纪》章义

Readings of the Aeneid

王承教 黄芙蓉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维吉尔注疏集

王承教 ● 主编



# 《埃涅阿斯纪》章义

Readings of the Aeneid

王承教 | 选编

王承教 黄芙蓉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涅阿斯纪》章义/王承教选编;王承教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080-5494-0

I. 埃… II. 王… III. 史诗-文学研究-古罗马  
IV. I54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8350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09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3.625

**字 数:** 354千字

**定 价:** 3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编者前言

——《埃涅阿斯纪》的解释传统

ō mihi praeteritōs referāt sī Iuppiter ānnōs!

[哦,但愿尤庇特还我那逝去的岁月!]

——《埃涅阿斯纪》, VIII 560

维吉尔是古罗马最重要的诗人,而《埃涅阿斯纪》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毫无疑问,如埃涅阿斯是命中注定的英雄一样,《埃涅阿斯纪》也注定是西方经典研读的核心。而正是由于史诗的这种核心地位,才保证了其源远流长的注疏传统。从追忆这一传统开始一本基础性的关于《埃涅阿斯纪》的文集,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

公元前19年,维吉尔病歿,在奥古斯都的主持下,诗人的好友瓦留斯(Varius)和图卡(Tucca)整理《埃涅阿斯纪》并出版。史诗很快就得到了罗马人的认可,维吉尔也因此广受景仰。之所以如此,据威廉斯(R. D. Williams)认为,其原因有二:一,维吉尔被认为是罗马民族自己的诗人,是罗马的理念和成就的代言人,他最终完成了从希腊诗歌向罗马诗歌的转变;二,无论就结构,还是就文辞和诗韵而言,维

## 2 《埃涅阿斯纪》章义

吉尔的诗艺都已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地。<sup>①</sup> 因此,维吉尔的诗歌成了众多罗马诗人模仿的对象。奥维德、卢坎(Lucan)、斯塔提乌斯(Stattius)、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等<sup>②</sup>都在“跟随着他的脚步”。<sup>③</sup> 哈迪(Philip Hardie)甚至认为,其后的诗人根本上乃“后维吉尔诗人”(Post-Virgilian Poets)。<sup>④</sup> 维吉尔的诗歌成了罗马青年人的教科书,公元1世纪时,昆体良(Quintilian)就已经开始用这些诗歌作为课程教育的基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来,甚至直到欧洲各民族语言全面取代拉丁语的统治地位之后,维吉尔也依然是拉丁语教学的绝佳教材。

自公元4世纪开始,大部分早期维吉尔作品注疏开始出现。这些注疏者包括多纳图斯(Donatus)、塞赫维乌斯(Servius)和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等人。塞赫维乌斯是公元4世纪最博学的语法学家之一,曾为泰伦提乌斯(Terence)和维吉尔作品作注。他的维吉尔作品注疏影响深远,且直到1600年,基本上都处于某种稳定状态(简称S本)。17世纪伊始,丹尼尔(Pierre Daniel)重订这些注疏,发现了更多的补充性内容,他认为这些注疏也是塞赫维乌斯的,并很自信地将这些抄件收集整理到一起,命名为《塞赫维乌斯注疏详优权威本》(Servii commentarii longe meliores et auctiores,简称DS本)。后世学者对此意见纷纭,但不少人倾向于认为,丹尼尔发现的那部分抄件应该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注疏,或至少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著

---

① 威廉斯,R. D. Williams,《对维吉尔态度之变化》(Changing Attitudes to Virgil),载D. R. Dudley, *Virgil*, London, 1969, 页119-139。

② Philip Hardie,《维吉尔史诗的继承者:对传统之运行的研究》(*The Epic Successors of Virgil: A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a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前言。该书主要描述了维吉尔之后一百年间,罗马诗人对维吉尔的模仿与反动。

③ 《神曲》之地狱篇,章二十三,行148。

④ Philip Hardie,《维吉尔》(*Virgil: Greece and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该书全面而系统地概述了维吉尔的作品,并为我们把握西方学术界对维吉尔的研究状况提供了极好的便利条件。

名维吉尔研究学者、“塞赫维乌斯注疏全编”发起者兰德(E. K. Rand)认为,DS本基本上代表了多纳图斯注疏的面貌。在他看来,DS本的写作对象是当时的教师们,故内容驳杂,属于材料收集性质的工作。而后来的塞赫维乌斯注疏的对象则是学生,所以他从DS本中选取素材,并将它们桥接起来,形成了后来的S本。也有人认为,DS本中收录的甚至还包括15和16世纪英国学界对维吉尔作品的注疏意见。<sup>①</sup>

《萨图恩节谈话录》(*The Saturnalia*)<sup>②</sup>以西塞罗的哲学和文学谈话作为模仿对象。在这部对话作品中,“八个对话者(包括塞赫维乌斯)在为期八天的萨图恩节上聚谈,讨论内容涉及各种学术话题,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谈论维吉尔”。即使是在讲述其他话题时,维吉尔的诗行也经常被引用不怠。焉何如此?因为至少自西塞罗开始,大部分罗马人认为,教育之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公共演讲的能力,即对修辞学的训练。而维吉尔则被公认为语言运用方面的大师。在马克罗比乌斯等人看来,作为一个作家,维吉尔“已经穷尽了拉丁语写作的可能性,涵括了所有拉丁语言的菁华。维吉尔将各种诗歌素材改编为拉丁语诗作的能力无与伦比,堪称奇迹”。<sup>③</sup>而且,在《埃涅阿斯纪》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罗马帝国的强大,也能重温罗马建城的历史和共和国的传统,以及远古以来的各种神话传说,这些东西对

① 参E. K. Rand,《多纳图斯的维吉尔注疏散佚了吗?》(Is Donatus's Commentary on Virgil Lost?),载*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10, No. 3 (Jul., 1916), 页158-164; J. P. Eldler,《新塞赫维乌斯注疏本》(*The New Servius*),载*Speculum*, Vol. 21, No. 4 (Oct., 1946), 页493-495。

② Macrobius,《萨图恩节谈话录》(*The Saturnalia*), Percival Vaughan Davis 英译,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③ 详参G. B. Townend,《伟大的维吉尔:观点的嬗变》(*Changing Views of Virgil's Greatness*),载*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56, No. 2 (Nov., 1960), 页67-77; 另参R. D. Williams,《对维吉尔态度之变化》(*Changing Attitudes to Virgil*),载D. R. Dudley, *Virgil*, London, 1969, 页119-139。

#### 4 《埃涅阿斯纪》章义

这个正在崩溃的帝国的精英,对这些最后的异教徒来说,当然具有某种极强的吸引力。对马克罗比乌斯等人而言,“维吉尔之伟大首先也就在于,他是罗马之伟大的说明与总结,是罗马之伟大的集大成者;作为诗人,他为那些历史陈迹注入了永恒的生命力”。<sup>①</sup>

## 二

公元5世纪以后,维吉尔的基督教读者赋予了他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别地位。这种地位使得他作为异教诗人却仍然可以在基督教世界里延续并加强自己的声誉。所有这些最初都与《牧歌》四和《埃涅阿斯纪》卷六以及但丁对维吉尔的推崇和对卷六的改编有关。实际上,自康斯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 the Great)开始,《牧歌》四便被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其传记作者尤塞比乌斯(Eusebius)记录下了他的一段讲辞,在这段讲辞中,康斯坦丁大帝对《牧歌》四做出了这样的阐释:维吉尔的这首牧歌其实预言了基督的降生。但为了避免受到迫害,他采取了寓言的写作方式。很显然,康斯坦丁非常乐意将自己新皈依的宗教与伟大的希腊—罗马异教传统联系起来。<sup>②</sup>接下来,此一路向的解释者还有奥古斯丁(Augustine),但他的意见与康斯坦丁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奥古斯丁看来,维吉尔并不知晓基督之诞生,这首牧歌中与弥赛亚相似的描述尽皆源于西比尔(Sibyl)预言。而西比尔预言却和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教渊源颇深。<sup>③</sup>于是,在后世的基督徒眼里,维吉尔成了某种可能的基督徒,或至少

---

① G. B. Townend,《伟大的维吉尔:观点的嬗变》(Changing Views of Virgil's Greatness),载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56, No. 2 (Nov., 1960), 页 69-70。

② R. S. Conway,《维吉尔弥赛亚风格的牧歌:意义、时机与源流》(*Virgil's Messianic Eclogue: Its Meaning, Occasion, & Sources*), London, 1907, 页 23。

③ 同上, 页 24。

是某种具有基督徒潜质的异教诗人,被认为是和伟大的希伯来先知类似的人物,甚至比他们更加理解基督教的精神内核。与此一致,由于维吉尔被公认为学识广博(这也是马克罗比乌斯等人推崇维吉尔的原因),尤其是在他的埋骨之所那不勒斯地区,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不断涌现出来。在这些传奇故事中,维吉尔成了非凡且仁慈(但并非总是如此)的魔法师。奥古斯都时代的许多奇异之事都被认为和他有关,甚至那不勒斯城的建立也是其魔法的结果。<sup>①</sup> 传播这些故事的人或许根本没有读过维吉尔,但他们却帮助人们牢牢记住了这个异教时代的诗人,并可能诱使一些人去阅读他的诗作。通过维吉尔,特洛亚的故事也依然可以广泛流传。在寓意解经法的观照下,《埃涅阿斯纪》这部激动人心的古罗马作品,被看成是对人类灵魂穿越生命之重重危险之过程的精彩描述。

和维吉尔一样,但丁也是一个 *doctus poeta* [博学的诗人], 所谓惟圣知圣,他对维吉尔思想的洞见,其他人根本无法企及。在但丁看来,维吉尔具有一种使人转向神圣真理的伟大能力——在《神曲》中,正是维吉尔把迷失在世俗欲望之黑暗丛林中的但丁解救了出来。唐南德(G. B. Townend)认为,<sup>②</sup>维吉尔作为但丁的引路人,具有多重重要的意义:首先,维吉尔就是历史上的那个维吉尔,他德性良善,才智卓越(这些都体现在他的诗作中)。次之,维吉尔是诗人,是语言大师(这一点激发但丁写出了《神曲》)。再次之,维吉尔是罗马和帝国的预言者,他为解决意大利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指明了道路。再者,维吉尔是意大利的爱国者,他渴望在奥古斯都的领导下实现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并以此为中心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而同样如

<sup>①</sup> Domenico Comparetti,《维吉尔在中世纪》(*Vergil in the Middle Ages*), E. F. M. Bencke 英译,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页 239 - 269; Tunison, 《大师维吉尔》(*Master Vergil*), Robert Clark & Co, Cincinnati, 1890。

<sup>②</sup> G. B. Townend,《伟大的维吉尔:观点的嬗变》(*Changing Views of Virgil's Greatness*), 载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56, No. 2 (Nov., 1960), 页 67 - 77。



此,但丁也希望意大利能够重拾帝国的辉煌)。最后,维吉尔代表着人性凭借理性、道德尊严和对人类及自然的深刻同情所能达至的一切:但丁认为,这是人类在没有基督启示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故而,但丁的维吉尔带领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之后,只能在天堂门口驻足,他最后对但丁说:

孩子,现在你已看过了现世的火和永恒的火,也走到了一个我的目力无法达到的地方。我已用智力和天恩把你带到这里;此后让你自己的意志来引导你……你坐在这里也好,你行在花间也好,不要再盼望我的话语,我的手势了。<sup>①</sup>

在天堂门口,但丁看着悄然离去的维吉尔,热泪潸然——正如埃涅阿斯面对狄多那样伤感。对于但丁的这一安排,后来的大诗人艾略特也深表赞同,称“维吉尔的位置就是但丁给他的那个位置”。<sup>②</sup>

### 三

然而,文艺复兴之后,但丁对维吉尔的解释却再也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了。用意大利语写就的《神曲》催生了民族语言文学的写作:相对希腊语和拉丁语写就的古典文学而言,以各民族语言写就的现代文学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于是,古今之争开始普遍出现了。荷马和维吉尔等人都因为老朽和不够现代而走向了没落。但丁以后,人们普遍地对罗曼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比如,在乔叟(Chaucer)和斯

---

<sup>①</sup> 但丁,《神曲》之炼狱篇,第二十七章末尾,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页367。

<sup>②</sup> T. S. Eliot,《论诗与诗人》(On Poetry and Poets),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79, 页121 - 132。

宾塞(Spenser)等人看来,《埃涅阿斯纪》最吸引人和最有价值的部分“要么是英雄的征战传奇——这一点其实正好是《埃涅阿斯纪》的弱点所在,要么是狄多的爱情和死亡——固然,该情节一直以来都让人泪湿青衫。然而,将这些情节从史诗的整体中抽离出来之后,它们也就没法儿得到恰当的理解和阐释了”。<sup>①</sup>

18世纪前后,新古典主义兴起。此一时期,诗人们,尤其是德莱顿(Dryden)和蒲柏(Alexander Pope)等广泛模仿维吉尔和贺拉斯等人的作品。新古典主义时期和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处于大乱之后的升平时期,都对帝国的观念怀有浓厚的兴趣。新古典主义诗人对维吉尔尤其尊重,他们广泛引用维吉尔的诗歌,现代西方最重要的维吉尔作品英译本即出自该时期,这就是迄今为止仍为人赞赏的德莱顿译《维吉尔作品集》(*The Works of Virgil*, 1697)。<sup>②</sup>

在新古典主义者眼里,维吉尔代表了古典作品的完美——不寻求激烈和新奇的效果,面对模仿对象,总要求精益求精。新古典主义推崇理性,强调明晰、对称、节制、优雅,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与和谐。他们认为诗歌不应该是个体性的,其结构应当严谨规整,不应该仅为一时的激情所蹴就,诗歌应该符合诗律方面的所有规定,应当包含良好公民道德的诉求。几乎没有人会比维吉尔更加符合这些规范了:“其十二卷史诗均用严格的六音步诗行写成(比许多古代诗歌更规整和严谨),他很少掺入主观性的描写,在遣词造句方面极其精确,即使在描写卑下的事物时,维吉尔也依然那样高贵而端庄。”<sup>③</sup>故而,在新

① G. B. Townend,《伟大的维吉尔:观点的嬗变》(Changing Views of Virgil's Greatness),载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56, No. 2 (Nov., 1960), 页 72。

② 《维吉尔诗歌集》(*The Works of Virgil; containing his Pastorals, Georgics, and Aeneis*), John Dryden 英译, 1697。

③ G. B. Townend,《伟大的维吉尔:观点的嬗变》(Changing Views of Virgil's Greatness),载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56, No. 2 (Nov., 1960), 页 72。

古典主义诗人们看来,维吉尔乃他们所在的“奥古斯都和平”时期的荣誉桂冠诗人。

18世纪后半叶,浪漫主义兴起,整个欧洲的文学观念再次发生转变。在浪漫主义者们看来,诗歌必须在诗人灵感乍现之际,一挥而就。像维吉尔那样,需要花费十几年来慢慢打磨一首诗歌的做法,就自然不会为他们所理解并欣赏了。柯勒律治(Coleridge)甚至还批评维吉尔说:“如果抽去维吉尔诗歌中的语词和诗律,你还能剩下些什么呢?”<sup>①</sup>

19世纪上半叶,维吉尔研究相对沉寂,但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现代维吉尔研究的许多奠基之作便纷纷出现了。这些奠基性工作包括:Otto Ribbeck(1859-1862)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文本校勘;Wagner(1866)重订了Heyne对维吉尔诗歌的注疏;Conington(1859-1871)和Sabbadini(1884-1888)等人也对维吉尔的三部主要作品进行了疏解;James Henry(1873-1886)和T. E. Page(1894-1900)等人为《埃涅阿斯纪》做了详细的笺注;与此同时,Thilo和Hagen(1878-1902)还校订出版了塞赫维乌斯的维吉尔古注;而意大利的Comparetti则著写了《维吉尔在中世纪》(1871)一书,该书至今仍然是维吉尔研究的经典之作。总之,所有这些著作都为后来的维吉尔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20世纪维吉尔研究铸就了新的起点。

#### 四

在19世纪末的古籍整理和文本校勘的坚定基础之上,20世纪的维吉尔研究一时间众声喧哗,热闹不已。而其中最突出的特征莫不

---

<sup>①</sup> Elizabeth Nichie,《维吉尔与英国诗人》(Vergil and the English Poets), New York, 1919, 页198, 注释1。

过是乐观解读和悲观解读的对立,或曰维吉尔研究之欧洲学派和哈佛学派的争吵。<sup>①</sup>

出现在 19 世纪初的维吉尔研究之欧洲学派由德国人领军,代表作包括海因兹(Richard Heinze)的《维吉尔史诗技艺》和诺顿(Eduard Norden)的《〈埃涅阿斯纪〉卷六注疏》,分别开创了维吉尔诗艺研究和单卷注疏的传统。<sup>②</sup>在他们的影响下,巴斯克若利(C. Buscaroli)于 1932 年在意大利出版了《〈埃涅阿斯纪〉卷四注疏》,康威(R. S. Conway)于 1935 年在英国出版了《〈埃涅阿斯纪〉卷一注疏》,皮斯(A. S. Pease)于 1935 年在美国出版了《〈埃涅阿斯纪〉卷四注疏》<sup>③</sup>……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关于维吉尔之《埃涅阿斯纪》的正统观点开始形成。稍后,以维吉尔二千年诞辰纪念为背景,大部分研究者开始强调他在文化上的核心作用,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这些人包括兰德(E. K. Rand)、海克(Th. Haecker)等人。<sup>④</sup>艾略特(Eliot)和麦凯尔(J. W. MacKail)也是此种观点的坚定持有者。在他们看来,《埃涅阿斯纪》乃欧洲版世界秩序的经典明证,欣然认可罗马帝国及其成就,并赞赏奥古斯都

① 几乎所有维吉尔研究方面的综述都会认真对待这一冲突。重点可参 Ernst A. Schmidt,《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意义:美国与德国路向》(The Meaning of Vergil's *Aeneid*: American and German Approaches), *CW* 94. 2 (2001), 页 145 - 171; S. J. Harrison,《二十世纪有关〈埃涅阿斯纪〉的一些观点》(Some Views of the *Aenei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载 *Oxford Readings in Vergil's Aeneid*, Ed. S. J. Harri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海因兹,《维吉尔的史诗技艺》(*Vergils epische Technik*), Leipzig and Berlin, 1903; Hazel, David Harvey 和 Fred Robertson 英译,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诺顿,《〈埃涅阿斯纪〉卷六注疏》(*P. Vergili Maronis Aeneis Liber VI*), Leipzig and Berlin, 1903。

③ C. Buscaroli,《〈埃涅阿斯纪〉卷四注疏》(*Virgilio: Il libro di Didone*), Millan, 1932; 康威,《〈埃涅阿斯纪〉卷一注疏》(*P. Vergili Maronis Aeneidos Liber Primus*), Cambridge, 1935; 皮斯,《〈埃涅阿斯纪〉卷四注疏》(*P. Vergili Maronis Aeneidos Liber Quartus*), Cambridge, Mass., 1935。

④ 兰德,《维吉尔之神技》(*The Magical Art of Virgil*), Cambridge, Mass., 1931; 海克,《维吉尔:西方之父》(*Vergil: Vater des Abendlandes*), Leipzig, 1931, A. W. Wheen 英译为 *Virgil: Father of the West*, New York, 1934。

的政治安排。<sup>①</sup> 50 和 60 年代以后,此种倾向的观点更有新的发展:波希尔(V. Pöschl)进一步考察维吉尔的诗歌艺术,Buchheit对《埃涅阿斯纪》和奈维乌斯的《迦太基战争》进行对比研究。Binder则在他的著作中大谈埃涅阿斯和奥古斯都之间的平行关系。Knauer的《〈埃涅阿斯纪〉与荷马》广征博引,详细论及了《埃涅阿斯纪》和荷马史诗之间的对应关系。<sup>②</sup> 80年代以后,哈迪开始探讨《埃涅阿斯纪》宇宙论方面的主题,认为在这部史诗中,自然世界与英雄行为及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sup>③</sup> 此即所谓“乐观解读派”,抑或“欧洲学派”。根本上而言,他们倾向于重点强调《埃涅阿斯纪》的正面价值,即荣耀罗马,肯定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帝国及其主导的和平力量。<sup>④</sup>

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出现于50年代,并在1960年代中期渐成气候。其代表人物包括布鲁克斯(Robert A. Brooks)、帕里(Adam Parry)、克劳森(Wendell Clausen)和普特兰(Michael Putnam)等。<sup>⑤</sup> 他

① 艾略特,《什么是经典?》(What is a Classic?), London, 1945; J. W. Mackail,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 of Virgil), Oxford, 1930, 导言, 页12-15。

② 波希尔,《维吉尔的诗艺》(Die Dichtkunst Vergils; Bild und Symbol in der Aeneis), Innsbruck, 1950, Gerda Seligson 英译为 The art of Vergil, Ann Arbor, 1970; V. Buchheit, Vergil über die Sendung Roms, Heidelberg, 1963; G. Binder, 《埃涅阿斯和奥古斯都》(Aeneas und Augustus), Meisenheim, 1971; G. N. Knauer,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与荷马》(Virgil's Aeneid and Homer), 载 Harrison 编, Oxford Reading in Vergil's Aenei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页390-412。

③ 哈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宇宙与帝国》(Virgil's Aeneid; Cosmos and Imperium), Oxford, 1986。

④ Jacob Klein, 《演讲与论文集》(Lectures and Essays), St. John's College Press, 1985, 页269。

⑤ 布鲁克斯,《Discolor Aura: 关于金枝的思考》(Discolor Aura; Reflections on the Golden Bough), AJP 74(1953), 页260-283; 帕里,《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两种声音》(The Two Voices of Virgil's Aeneid), Arion 2(1963), 页66-80; 克劳森,《〈埃涅阿斯纪〉一解》(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eneid), HSCP 68(1964), 页139-147。该文实写于1949年; 普特兰,《诗歌〈埃涅阿斯纪〉:想象性的整体与设计四论》(The Poetry of the Aeneid; Four Studies in Imaginative Unity and Design), Cambridge, Mass., 1965。

们反对传统的乐观解读,否认《埃涅阿斯纪》通过描写其最终胜利强调了秩序和文明之价值。在他们看来,史诗表面上描述的是埃涅阿斯和罗马的荣耀,实际上却表达出了一种悲观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埃涅阿斯纪》讲述的是一个长长的关于失败和丧失的故事。其中涵括了两种声音,一个声音公开地描述胜利,另一个声音则私密地诉说遗憾和悔恨。他们认为,政治成功的阴暗面和帝国的沉重代价才是《埃涅阿斯纪》所要表述的题旨,而且,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史诗中的人物都对这种沉重的代价感同身受。在哈佛学派的维吉尔研究者看来,埃涅阿斯软弱敏感,犹犹豫豫,被命运弄得麻木不堪。普特兰也认为,包括维吉尔诗行中的语词重复等都表明,埃涅阿斯的心思犹疑不定,完全异于传统史诗中的英雄。60至70年代,奎因(Kenneth Quinn)、安德森(W. S. Anderson)等人采用新批评派的方法,进一步推进了对《埃涅阿斯纪》的悲观解读。<sup>①</sup>70年代后期,约翰逊(W. R. Johnson)重拾悲观解读之余绪,在《可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一书中,采用哈佛学派较少援用的宇宙论和诸神体系,构造出一种深刻的悲剧性解释,形成了对欧洲学派之肯定观点的极端批评:《埃涅阿斯纪》则成了一座“令人恐惧的史诗”。<sup>②</sup>

关于“欧洲学派”和“哈佛学派”的提法,究竟是否合适,仍然值得讨论。维吉尔研究史家卡伦多尔夫(Craig Kallendorf)就曾指出,哈佛学派的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sup>③</sup>根本问题可能还在于我们解读《埃涅阿斯纪》的视角,维吉尔说他讲述的是“战争和人”的故

① 奎因,《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批判性描述》(*Virgil's Aeneid: A Critical Description*), London, 1968; 安德森,《〈埃涅阿斯纪〉的技艺》(*The Art of Aeneid*), Englewood Cliffs, NJ, 1967。

② 约翰逊,《可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 Berkeley & London, 1976。

③ Craig Kallendorf,《哈佛学派的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学术界对〈埃涅阿斯纪〉的悲观解读》(*Historicizing the "Harvard School": Pessimistic Readings of the Aeneid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cholarship*),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99, (1999), 页 391 - 403。

事,这里的战争是一种群体行为,是希腊人和特洛亚人的战争,是特洛亚人和拉丁人的战争,是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战争,而个人则分别是埃涅阿斯、狄多、图尔努斯等个体,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个体价值,必然会得出悲观的解读,而强调罗马的价值,则必然会是乐观的看法。进入到现代社会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关于个体自由的观念成了不刊之论,“哈佛学派”应时而起,并不奇怪。Ernst A. Schmidt 也曾指出,德国人和美国人对《埃涅阿斯纪》的解读路向不同,问题在于两国人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差异:德国作为后起的帝国和随后两次战败的帝国,其民众召唤的是共同的民族价值,埃涅阿斯所背负的罗马帝国的使命正好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美国人在越南战争的刺激之后,对一切帝国价值都充满了怀疑,最终成就了对《埃涅阿斯纪》悲观解读的气候。

## 五

毫无疑问,长期以来,在欧洲学派与哈佛学派或乐观与悲观的对立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超越这种简单对立的努力。这种努力将抛却一系列落入窠臼的问题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sup>①</sup> 做出这种努力的人大多集中在英、法学界。在法国学界,先后有 Sainte - Beuve, A. Cartault, A. - M. Guillemin, 布里松(J. Brisson), R. Lesueur, J. Perret 等人,他们都对维吉尔提出了比较谦和的肯定性意见。<sup>②</sup> 在英国学

① Alessandro Schiesaro,《评 O' Hara 的〈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死亡和乐观的神喻〉》,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88, No. 3, (Jul., 1993), 页 258 - 265。

② Sainte - Beuve,《维吉尔研究》(*Etude sur Virgile*), Paris, 1857; A. Cartault,《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技艺》(*L' Art de Virgile dans l' Eneide*), Paris, 1926; A. - M. Guillemin,《维吉尔的原创性》(*L' Originalite de Virgile*), Paris, 1931; 布里松,《维吉尔:他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Virgile: Son temps et le notre*), Paris, 1966; R. Lesueur,《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史诗韵律结构研究》(*L' Eneide de Virgile: Etude sur la composition rythmique d' une epee*), Paris, 1977 - 1981; J. Perret,《维吉尔:〈埃涅阿斯纪〉》(*Virgile: L' eneide*) 三卷本, Paris, 1977 - 1980。

界,先后有奥斯汀(A. G. Austin)、威廉斯(R. D. Williams)<sup>①</sup>和坎普斯(W. A. Camps)等人。奥斯汀基本上循着19世纪英国学界的观点,认为维吉尔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诗人,《埃涅阿斯纪》显然庆祝了埃涅阿斯和罗马的伟大胜利,但同时也表达了对胜、败双方所遭受的苦难的同情。威廉斯则受到哈佛学派的影响,在其作品中讨论“公开的声音”与“私密的声音”之间的紧张,但同时拒绝极端的观点。坎普斯在《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导读》中,采用了一种更加严格和现实的态度。他强调历史背景下的政治现实、命运和天神的重要性,描述了罗马价值的推广和提升,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由此带来的苦难。坎普斯认为,世界的力量和运动会压迫个体的生命,然而,人类的品质表现在人们对此一压迫的回应之中。<sup>②</sup>

另外一种超出悲观解读与乐观解读之简单对立的努力也很值得一提:克莱因(Jacob Klein)、阿尔维斯(John Alvis)和阿德勒(Eve Adler)等人在政治哲学的视野内对《埃涅阿斯纪》做出了出色的解读。在《荷马和维吉尔作品中天神的意图与英雄的回应:宙斯的政治计划》(*Divine Purpose and Heroic Response in Homer and Virgil: The Political Plan of Zeus*)中,阿尔维斯试图从柏拉图的灵魂三分说出发讨论《埃涅阿斯纪》的意义。<sup>③</sup> 克莱因则在《〈埃涅阿斯纪〉的神话》一文

① 奥斯汀,先后出版了《埃涅阿斯纪》卷一(1971)、卷二(1964)、卷四(1955)和卷六(1977)的注疏,Oxford;威廉斯,先后出版了《埃涅阿斯纪》卷三(1962)和卷五(1960)的注疏,Oxford。另有《〈埃涅阿斯纪〉注疏》(*The Aeneid of Virgil*)两卷本全文注疏,London,1972。《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London,1987。

② 坎普斯,《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导读》(*An Introduction to Virgil's Aeneid*),Oxford,1969。

③ 阿尔维斯,《荷马和维吉尔作品中天神的意图与英雄的回应:宙斯的政治计划》(*Divine Purpose and Heroic Response in Homer and Virgil: The Political Plan of Zeu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5。阿尔维斯认为,史诗卷七中蜜蜂落在月桂树枝上构成的意象暗指向卷六的金枝,因为蜜蜂也是黄色的。而维吉尔又曾在《农事诗》中提到过蜂群内部俨然有一个帝国的政治秩序,因此,阿尔维斯推论说,金枝即是帝国政制的象征。



中,引入柏拉图《治邦者》(*Statesman*)中的神话,来解释维吉尔所言的“黄金时代”,其结论是:“维吉尔征用柏拉图的神话,这一点决定了《埃涅阿斯纪》的写作,并暗示了维吉尔跟荷马之间真正的关系。荷马的时代乃宙斯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多灾多难的远征、不幸的战争和纷争的王权。其开始已经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反映出来,而高潮则是布置战争。荷马史诗的内容必须被理解为派生性质的,是克罗诺斯时代的翻转。”<sup>①</sup>于是,描述黄金时代,亦即克罗诺斯时代的维吉尔式诗人反而成了荷马式诗人的模仿对象!

显然,阿德勒(Eve Adler)《维吉尔的帝国——〈埃涅阿斯纪〉的政治思想》<sup>②</sup>也是从乐观与悲观之二元对立的背景下着手的。开篇伊始,阿德勒就宣称:“当今维吉尔《埃涅阿斯纪》解释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可以说是:维吉尔在史诗中支持奥古斯都还是反对奥古斯都、支持帝国还是反对帝国、支持罗马还是反对罗马?”接下来,她话锋一转,“……(维吉尔的)意图突破了这个问题的框架。他的目的既不在于支持也不在于反对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其目的在于开创自己的帝国”。阿德勒认为,《埃涅阿斯纪》是一部立国诗(*foundation poem*),其原因不在于史诗讲述的是埃涅阿斯筚路蓝缕初创罗马和奥古斯都新建罗马帝国的故事,而在于维吉尔声称自己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更伟大的时序(*maior rerum ordo*,《埃涅阿斯纪》VII,44)。阿德勒认为,维吉尔之所以写作《埃涅阿斯纪》,原因在于,他看到了科学启蒙与习传宗教之间的冲突,而且,他还看到,这种冲突将要导致的严重后果——罗马政治共同体的覆亡。为挽大厦之将倾,维吉尔毕其功于一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全力著成《埃涅阿斯纪》这部史诗。

① 克莱因,《〈埃涅阿斯纪〉的神话》(*The Myth of Aeneid*),载 Robert B. Williamson 和 Elliott Zuckerman 编选, *Jacob Klein: Lectures and Essays*, St. John's College Press, 1985, 页 269-284。

② 阿德勒,《维吉尔的帝国——〈埃涅阿斯纪〉的政治思想》(*Vergil's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Aeneid*), Lanham, MD, 2003。